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汤一介 著

# 郭象与魏晋玄学

(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汤一介 著

# 郭象与魏晋玄学

(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象与魏晋玄学(第三版)/汤一介著.—3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ISBN 978-7-301-06617-1

I. 郭… II. 汤… III. 郭象(252~312)—玄学—研究 IV. B23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7628 号

书 名: 郭象与魏晋玄学(第三版)

著作责任者: 汤一介 著

责任编辑: 张文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6617-1/B · 026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w@pup.pku.edu.cn](mailto: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 版 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25 印张 342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2 版 2009 年 11 月第 3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出版说明

1912年11月31日，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大学作讲演，北京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成为最高学府者”，“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世界之文明是焉”，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所在，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欵！”蔡元培先生长北京大学后，对北大的第一个改革就是要改变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陈旧观念，明确“大学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他解聘了一批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教师，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不拘一格地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中外教师，建立研究所，组织学术社团，举办学术讲座，创设学术刊物，鼓励教师和学生研究学问。他还在校行政会议下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大学出版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出版图书，规划出版事务，并设立独立的出版部，公开出版大学的讲义、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北大的学风为之一变，很快成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李大钊先生在《本校成立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中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百年来，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科学的创新精神、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和学者教授。他们坚守教育和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百年来，北大学者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旨在集中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同时，也向中国和世界展示北大在中国教育和学术文化发展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1995年起，北大出版社开始启动“北大名家名著文丛”项目，计划出版100位北大名家的百余部著作。1997年，北京市政协委员、香港企

业家杨超成先生到北大出版社参观时,得知北大出版社的“名家名著”项目,慷慨捐助 50 万港元,资助十位学者著作的出版。至 2003 年,已出版冯友兰、陈岱孙、汤用彤、翦伯赞、唐钺、费孝通、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吴组缃、宗白华、王瑶、杨周翰、王宪军、周祖漠、许渊冲、赵靖、陈贻焮、田余庆、汤一介、张国华、赵齐平、袁行霈等著名学者的论著 26 种。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所有的品种被重印,有的印书超过 5 万多册。有多种著作还向海外转让了版权。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所选作品的作者是在北大任教(或任教过)的学者和教授的著述。曾在北大学习过但未在北大工作过的不在选编之内;所选作品的作者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所选作品是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影响的著作,或是某一学科和学术领域里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是与译介外国学术密切相连。近代的学者在译介外国思想和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译作常常是他们思想和学识的集中体现,如严复的译作《天演论》等,由于本社另设《未名译库》,凡北大名家的译作本丛书中不再收入。

名家名著即需要经过历史的长期检验,也需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补充。由于我们学术素养的限制和经验的缺乏,本丛书的编选工作中存在不少疏漏,希望学术界、读书界的朋友,尤其是北大的教师和校友们提出批评建议,以使“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这朵学术之花在中国的学术出版中绽放的更加绚丽灿烂。

2009.10.18

# 目 录

绪 论 .....	1
<b>第一章 论魏晋玄风 .....</b>	<b>7</b>
一 何谓“魏晋玄学”？ .....	7
二 魏晋玄学的产生 .....	10
<b>第二章 研究魏晋玄学的资料问题 .....</b>	<b>23</b>
<b>第三章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评价问题 .....</b>	<b>39</b>
一 魏晋玄学的产生 .....	39
二 魏晋玄学的评价 .....	66
<b>第四章 魏晋玄学发展的历史(上) .....</b>	<b>85</b>
一 正始时期的玄学 .....	87
二 竹林时期的玄学 .....	111
<b>第五章 魏晋玄学发展的历史(下) .....</b>	<b>126</b>
一 元康时期的玄学 .....	126
二 东晋时期的玄学 .....	155
三 唐初重玄学 .....	169
<b>第六章 郭象的生平与著作 .....</b>	<b>188</b>
<b>第七章 郭象与向秀 .....</b>	<b>196</b>

<b>第八章 郭象与裴頠</b>	214
一 “有始”与“无始”	218
二 “外资”与“独化”	219
三 “无为”与“有为”	220
四 “入世”与“超世”	221
<b>第九章 郭象的《庄子注》与庄周的《庄子》</b>	223
一 关于“自性”的问题	227
二 关于“无为”的问题	228
三 关于“圣人”的问题	230
四 关于“无”的问题	233
<b>第十章 郭象的《庄子注》与《庄子》的旧说</b>	238
<b>第十一章 郭象的哲学方法</b>	250
一 寄言出意	250
二 辩名析理	262
三 否定的方法	269
<b>第十二章 郭象哲学中的理论问题(上)</b>	273
一 关于“有”与“无”的问题	273
二 关于“动”与“静”的问题	276
三 关于“知”与“无知”的问题	279
四 圣人“可学致”与“不可学致”的问题	281
<b>第十三章 郭象哲学中的理论问题(下)</b>	285
一 “(命)理”与“自性”	285
二 “独化”与“相因”	287
三 “无待”与“有待”,“无为”与“有为”	289
四 “顺性”与“安命”	292
<b>第十四章 郭象与王弼</b>	295

目 录

附录 有关郭象的生平和著作的资料 .....	301
参考书目 .....	313
第三版后记 .....	314

# 绪 论

当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一个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哲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作出科学分析的重要课题。这几年来，许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可喜的成绩，对进一步开展这门学科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本小书希望能在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一步科学化上起一点添砖加瓦的作用，因此想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些探讨。

## （1）研究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揭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一步科学化的最重要的问题

研究哲学史当然要研究某一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等等，但严格说来，这些并不是哲学史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哲学史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揭示人类思维在历史上如何发展的内在逻辑。比如说，先秦哲学思想由孔子发展到了孟子，它在理论思维的发展上有什么必然性？虽然这一发展的动因是社会矛盾提出的要求，但思维发展必然有其自身的规律。

一部好的哲学史必然是既能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动因，又能揭示出哲学思想这样一种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是合乎于思维逻辑的发展；对哲学史上思想的内在逻辑的分析也必然合乎于历史发展的本质，所以列宁说：“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和思维规律相吻合。”（《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页）

魏晋玄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的王弼、何晏，发展到竹林时期（254—262年）的嵇康、向秀，又发展到元康、永嘉前后（290年前后）的裴徽、郭象，到东晋则有张湛、道安，这个发展固然和当时社会的变动有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为什么由正始时期王弼、何晏的“贵无”（“以无为本”）发展到竹林时期嵇康的“贵无”（“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向秀的“崇有”（“以儒道为一”），又由竹林时期的玄学发展

到元康时期裴徽的“崇有”（“自生而必体有”）和郭象的“独化”（“物各自造”），到东晋而有张湛的“贵无”（“群有以至虚为宗”）和道安的“本无”（“无在万化之先”），这一思想发展的过程有什么内在逻辑的必然性？本书打算围绕着对郭象哲学思想的分析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 （2）研究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是揭示理论思维发展规律的根本途径

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必然以一系列概念、范畴以及由概念、范畴形成的命题（判断）和推理表现的，因此可以说哲学思想发展就其内容说是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恩格斯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恩格斯这里说的“以往的哲学”自然就包括哲学史的内容。一部科学的哲学史必然是能揭示人类认识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在矛盾冲突中发展的规律，而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最基本的内容则是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由于概念、范畴在哲学史中的发展反映着人们认识的深入，我们研究它的发展历史就是把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在自己的思想中再想一次，当然是排除了种种偶然的、次要的因素，而抓住本质的、带规律性的内容。这种重新思索的过程，必然使我们自己的思想也深化了，所以列宁说：“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和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

黑格尔说：“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47页）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更有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哲学有它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正因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对这些概念、范畴就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范畴去套，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等同。在我国哲学史上，长期形成的一套概念、范畴，除少量吸收了印度佛教的概念之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所以它的特点也是很鲜明的。例如，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和“人”这对范畴就非常重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仅对天人关系的问题比较重视，而且不同的哲学家对“天”的解释就不相同，对“人性”的看法更是

众说纷纭了。早在先秦就有韩非的《解老》，它实际上就是对《老子》书中的一些哲学概念的含义的一种解释；东汉的《白虎通义》也对两汉某些哲学概念作了适应当时统治阶级需要的说明；在王弼的《周易略例》、《老子指略》中也包含有用玄学思想解释哲学概念的意义；南宋陈淳作《北溪先生字义》对朱熹的范畴体系作了分析；清朝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则是一部解释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并反映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理论思维水平。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在那时难道不是因为有一定高度的理论思维吗？我们今天总结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运用一套特有的概念、范畴来进行理论思维时，难道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吗？

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比较强的哲学，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例如，在魏晋玄学中“有”、“无”、“体”、“用”、“本”、“末”、“一”、“多”、“言”、“意”、“性”、“情”、“独化”、“相因”、“名教”、“自然”、“无心”、“顺有”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概念、范畴都被成对地提出来了。这中间有的虽是先秦哲学中已有的，但在魏晋玄学中，它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含义更加明确了。本书打算以郭象哲学思想体系为中心，对魏晋玄学中的概念、范畴作些具体的分析。

### **(3) 研究一个时期哲学家建立其哲学体系的方法，对了解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水平和它的特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的产生虽然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但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往往是使这种由社会历史动因所产生的某种哲学思潮成为系统的完备的新学说的重要条件。没有建立哲学体系的新方法，则无以建立起新的哲学体系。从哲学发展的历史看，往往是在有了新的哲学方法之后，才为新的哲学思潮的广泛流传开辟道路，而且其影响往往及于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哲学或者说有“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内容和他建立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方法，都应是哲学史研究的课题。有时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本身并不正确或者也不很深刻，但他建立其哲学体系的方法却可以很有水平，并表现了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某些特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哲学史上某些哲学家建立其哲学体

系的方法或者对我们更有启发。

魏晋玄学这种新的哲学思潮的流行和完备,是由于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出现而发生的。这种新的哲学方法称之为“言意之辩”。就魏晋玄学家说,几乎都讨论了“言”和“意”的关系问题,王弼首唱“得意忘言”,嵇康继之;郭象又提出“寄言出意”,这也本之于王弼“得意忘言”。而“辨名析理”同样是这一时期玄学家共同采用的一种方法。

就“言”和“意”这对范畴说,它本身是个哲学问题,在魏晋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分三派:言不尽意派,如张韩有《不用舌论》,以言语为无用;言尽意派,如欧阳建有《言尽意论》,主张言可尽意;得意忘言派,如王弼、郭象、嵇康等均属之。王弼以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而“得意”必须“忘言”。但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如王弼、郭象等不仅讨论“言”、“意”本身这一哲学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作为建立他们哲学体系的根本方法。王弼言“贵无”,以无为本,而“无”作为宇宙本体无形无名,本不可说,那么如何把握这个作为宇宙本体之“无”呢?如果说,根本不能把握,那么就无法证明天地万物是“以无为本”,如果“本体”可说,那么“本体”就成为认识的对象,而有名有形。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王弼提出“得意忘言”这一玄学方法。魏晋玄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调和儒、道,但是儒家和道家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庄子》一书指名道姓地诋毁孔子,这怎样调和呢?郭象《庄子注》采用了“寄言出意”的方法,力图解决这个矛盾。从王弼用“得意忘言”的方法,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如何论证“无”和“有”的“体”、“用”关系,而建立其“贵无”思想体系。从郭象用“寄言出意”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解决当时调和儒、道这一难题,而建立了他的新哲学体系的。

魏晋玄学的方法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方法,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将不仅会丰富哲学史研究的内容,而且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水平和特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4) 研究外来思想文化的传入和与原有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是认识原有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方法

当前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表现为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世界的动荡不安、矛盾冲突,除了其他原因(如政治的、经济的)之外,思想文化传统的不同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和西方世界的矛盾,其中就有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原因。但是,由于世

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思想文化的互相影响,在思想文化上的调和和互相吸收的趋势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更给予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课题。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欧,是西欧的历史条件下激烈动荡下的产物,因此仅就思想文化传统方面说,它对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则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那么也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原有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在一个国家(民族、地域)生根、发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必须与原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或者说必须通过对原有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否则就不能真正起作用。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是不是也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呢?应该说是可以的。就中国哲学今后发展的趋势看,中国哲学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还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哲学的中国哲学呢?这当然还要看一个时期,但我看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些。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哲学思想(实际上也是整个文化、整个社会)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这就是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传。佛教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这种外来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如何与原有传统思想文化结合,如何由形式的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到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明显冲突,而最后融合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这个发展过程,将是很有意义的。

在历史上思想文化有不同的类型,怎样才能了解一种思想文化的特点和发展水平,必须在和另外的思想文化比较中来揭示。如果我们把汉、魏、两晋、南北朝传入中国的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比较,这样我们不仅可以较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和发展的水平,而且也可以了解外来思想文化如何能为我们吸收、融化的原因。这种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和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地域的哲学思想相比较的分析研究方法,就是比较哲学。当前,我们应该开展这个方面的研究,以建立适应当前世界哲学发展潮流的中国比较哲学。

科学研究是一项严肃的事情,应当力求能够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但是同时科学研究也是一项带有探索性的工作,应该敢于提出新的问题和看法。这本小书提出和探讨了一些问题,虽然我对这些问题认真对待的,但限于水平,有些看法是很不成熟的,甚至还可能是不正确的,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 第一章 论魏晋玄风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理论思维水平所达到的高度。魏晋时期的玄学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郭象是魏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哲学发展的最高点。对一种哲学思潮发展的最高形态作具体的分析,应该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深入地把握这种思潮的各个方面。因此,本书打算通过对郭象哲学思想的分析,对魏晋玄学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哲学史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起点,而“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我们研究历史科学应该遵循马克思这个科学论断:“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成什么事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6页)

## 一、何谓“魏晋玄学”?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我国最早出现“形而上”一词是《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西方哲学史上,原来亚里士多德把我们称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叫做“第一哲学”。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亚里士多德毫不含糊地把纯粹哲学或形而上学与其他的科学区别开来,认为它是一种‘研究存在之为存在以及存在的自在自为的性质的科学’。”据 D. D. Runes 的《哲学字典》说,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自身的科学(the science of being as such),这里“科学”一词是就古典的意义上说的,也就是关于“终极原因”的知识,即关于“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的知识。这个“第一原理”(终极原因)被视为没有比它更高的、更完全的普遍性,它对人类的智慧说只能是靠其自身本性的能力得到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文

版,对这里的“形而上学”有一条译注说:“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经验以外的各种问题,如关于存在的始原,关于世界的实质,关于上帝,关于灵魂,关于意志自由等等。”这条译注对马克思这里所用的“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的含义的解释是正确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就是指把经济关系作为一种超验的、抽象的永恒观念来对待。所以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玄学)并不都是说的和辩证法相对立的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看问题的方法。当然,前面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往往也是把世界的实质看成是静态的、永恒不变的存在。我们把魏晋时期的哲学称为“魏晋玄学”大体也是在上面所说的那个意义上讲的。

“玄学”这个名称,见于梁沈约的《宋书》,该书《雷次宗传》曾说: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  
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  
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  
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见。

然而或者在西晋时代已经使用了“玄学”这个名称,据《晋书》卷五四《陆云传》说:

(陆)云……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少年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  
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  
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近人章炳麟在《五朝学》中较明确地说明了“玄学”的性质,他说:

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话;……五朝有玄学,知与恬  
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于上,躁竞弭乎下。……五朝所以  
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

而在魏晋时一般常把“玄学”称为“玄远”之学,《世说新语·德行》注引《魏氏春秋》说:“上曰: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  
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又同书《规箴》说:“王夷甫(衍)雅尚玄  
远。”陆澄《与王俭书》说:“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嵩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

行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隽神清识，能言玄远。”像这样用“玄远”一词说明当时学风的史料在魏晋南北朝时还有很多，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不过，我们还要把何劭《荀粲传》中的一段话引用下来，因为它谈及这个名称的含义问题。

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侯难曰：“《易》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傅）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释。

按《世说新语·文学》中说：“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又同书《言语》中说：“裴仆射（𬱟）善言名理，混混有雅致”，而孙盛《老聃非大贤论》说：“昔裴逸民（𬱟）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可见所谓“玄远”、“虚胜”、“名理”三者的含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谓“名理”，开始盖为讨论“名分之理”，人君臣民各有其职守，如何使之名实相符而天下治，此为政治理论的问题；后来渐进而讨论鉴识人物的标准问题，于是“名理之学”趋向“辨名析理”，向着抽象原则的方面发展，如当时有钟会、傅嘏、李丰、王广等所谓“四本才性”问题的讨论。“虚胜”则谓为“虚无贵胜之道”（语见章炳麟《黄巾道士缘起》），盖所论不关具体事实，而以谈某些抽象原则为高明，但似仍未离政治人伦的抽象原理而进入宇宙本体的形而上学领域。“善言虚胜”者必“善名理”，所以《世说新语·文学》说傅嘏“善言虚胜”，而《荀粲传》说他“善名理”，就很自然了。然“善名理”者则不一定都能“达虚胜之道”，如上引材料说裴𬱟则是（这两条材料对裴𬱟的评论是否正确，当为另一问题，但可以了解当时认为“名理”和“虚胜”确有不同的含义）。“玄学”（玄远之学）则更前进一步，把讨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作为中心课题，要为政治人伦找一形而上学的根据，而进入本体论问题的讨论。“玄远”在当时或有二义：说阮籍“言及玄远”，则指远离“事务”（世事），仍属政治人伦方面；而说荀粲“尚玄远”，则指远离“事物”，则属于超言绝象的形而上学问题。虽然这二者往往联在一起，但意义则不相同。